

乡落地生根，但对故乡的依恋却始终未曾泯灭。

越洋生死劫

下南洋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汉代的船只从徐闻、合浦等地出发，向南航行，最远可到“已程不国”，即今斯里兰卡。广州的西汉南越文王墓中，出土了波斯银盒、红海乳香、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海外舶来品。

到了隋唐时期，国力强盛、开放包容，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，华夏商贾的舟楫频频往来于南洋诸地。中国船员到达东南亚诸国，带来了无数财富，也得到了无上尊崇，这也是为何现在海外华人华侨仍自称为“唐人”，称祖国为“唐山”，华人华侨的聚居地被称为“唐人街”的原因。

宋元时期，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，北宋朱彧《萍洲可谈》记载了广东人的住蕃现象，称“广人举债总一倍，约舶过回偿，住蕃虽十年不归，息亦不增”。

明代郑和下西洋后，福建、广东商人移民马六甲、檳城、新加坡，与马来、印尼等原住民通婚，留下了一个混血族群，又称海峡华人、侨生，区别于后来的



上图：华人在南洋艰辛劳作的历史。摄影/王哲

中国移民（新客）。女性称娘惹，男性称峇峇，合称峇峇娘惹。

娘惹文化没有简单融入马来文化，也没有把中国传统原封不动搬来，而是在保留姓氏、祖先、家族伦理和宅门秩序的同时，吸收了欧洲生活方式和马来饮食、服饰、语言和南洋气候中的生活技术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南洋华人上层文化形态。

而在过去数次移民南洋的浪潮里，最大的一次，要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公开允许华工在“情甘出口”的情况下自由出洋。

出国务工名义上合法，实际是公开的人口贩卖。出发前往南洋前，华工们需以“赊欠旅费”的名义与蛇头签高利贷合同，成为欠蛇头一屁股债的“债务人”。根据与蛇头的合约，华工工作的前三年都在向蛇头“还债”，薪资大部分都给了蛇头。

今天，广东飞到曼谷只需4

个小时，当时却需7—10天的航海。在凶险难料的大海之上，悲剧时常上演。

船舱内，数百人挤在一起，“日则并肩叠膝而坐，夜则交股架足而眠”。舱底不见天日，臭气熏天，淡水极度匮乏，食物常常腐坏发霉，瘟疫频发。遇上逆风的

漫漫长途，饮水和口粮愈发捉襟见肘，许多人未抵目的地便病饿而死。倘若遭遇风暴、触礁或海盗劫掠，整船人几无人生还——1822年下南洋的泰兴号海难，2000人登船，仅180余人幸存，所谓“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”，寥寥九个字道尽跨海谋生的艰难。

至于国人当时为何非要下南洋？哈佛历史学家孔飞力认为，华人海外移民不是孤立事件，而应放在中国更大的内部迁徙和人口压力背景中理解。他提到，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约1.424亿增长到1840年的约4.128亿，人均土地面积大幅下降。

美国历史学家穆欣更是从全球史的视角进一步说明，华人迁徙的背后是19世纪全球资本、航运、殖民产业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塑造的结果。中国沿海被挤出来的人口，正好遇上东南亚矿山、港口、种植园和商业城市对劳动